

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放鞭炮=砍树》，说鞭炮是用纸一层层裹着火药芯子做成，鞭炮放过后，这张纸就无法再回收利用，这行为无异于是在砍树，因为纸张是用木材做成的。

现在我们又知道，放鞭炮更是严重地污染了空气。据报道，北京除夕夜因燃放鞭炮，pm2.5的小时浓度升高80倍，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中重度污染。

Pm2.5是个新名词，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.5微米的颗粒物，可被人吸入肺内，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。pm2.5颗粒物，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，且在大气中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，对人体健康和空气质量影响更大。

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。要民俗还是要环保？“鱼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”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怎么办？放鞭炮是民俗，是过年气氛的体现，爆竹声中一岁除，鞭炮声震耳欲聋时，不是除夕夜就是初五迎财神，不放鞭炮，冷冷清清，年味寡淡，无味，兴趣索然，那就放吧？你放我放大家放，不说噪音闹心，不说浪费纸张，不说鞭炮

可能伤人，光说这pm2.5暴增，严重污染空气，这代价就难以承受。尤其是初五零时迎财神之刻，全城高楼大厦的窗口，马路边弄堂口，到处火光闪闪，硝烟弥漫，“炮”声隆隆，空气中飘散着浓重的硫磺味。初五白天上街，天空中必定是黄色的雾霾浓郁地密布在低空，能见度极低，连阳光也似乎透不进

两难选择

康定

来，这时的空气里，不知道有多少有毒有害的物质，这可是全被我们吸到肺腑里去了呀，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倒可能是干净的，有毒有害的微小颗粒全粘在我们的肺腑里血管里，我们的肺成了空气清新机了。我们要民俗还是要健康？

民俗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行为，当然不应舍弃，也舍弃不了。北京曾经有过禁放鞭炮烟花的禁令，但最后还是因无法令行禁止而放弃了。由此可见民俗的顽强生命力。但我们恐怕也应明白，古代地广人稀，物资贫乏，放几个焰火鞭炮不会影响空气质量，如今

城市里人口稠密，尤其是京津沪穗深这类大城市，小小地方聚集着一千万至两千多万的人口，现在物资又比古代丰富许多，放起鞭炮焰火又没有什么节制，一味只图自己尽兴，这么你我他大家兴高采烈地放，最后有毒有害物质又被你我他大家吸进肺腑里，完成一个循环，值还是不值？这民俗要不要改一改？

西方的基督教在十六世纪时就出现过宗教改革，因为原来的旧教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，马丁·路德、加尔文等的宗教改革，把勤奋、节俭、经商致富、财富积累解释成是上帝的旨意，是受命于上帝，这就适应了，于是乎新教就兴盛起来，资本主义也得到迅猛发展。我们的放鞭炮民俗，也应该有人出来设计一番，改革一番才好。香港人的办法是发明电子鞭炮，有气氛有声响而无污染，但内地却不太接受，有没有更好更周全的改进方案？

我在十多年前，也年年春节放鞭炮，因为小时候正逢“文革”，只放过很少量的小鞭炮，人到中年补一补孩童的乐趣。当我知道放鞭炮浪费纸张后，我就不放了，现在知道了pm2.5的知识，我更不会去放了。因为，稍稍改掉一点点自己的习惯行为而有利于环保和健康，这是值得去做的。

时间回到70多年以前，谈谈一些难忘的故事。1935年秋天，我幸运地考上武汉大学电机工程系，成为武大第一届电机工程系的学生，喜悦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。

一到校，我被分配住进学生宿舍，仄字斋二人一间的寝室。一进屋就见到同寝室的李健章学长。当然，大家一见如故，非常高兴。他是安徽人，我是浙江人，交谈都没有困难，感到很亲热。可是我们念的系不一样，我念的是电机工程系，他念的却是中文系。因为所学不同，渐渐产生了一些矛盾，他喜欢大声朗读古文，我则喜欢拆装无线电收音机，相互发生了难忍的干扰。怎么办，于是他的朗读声就越来越高，要压倒我的收音机声，而我也不肯示弱，就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得越来越高，要压倒他的朗读声。结果怎样，哈，整个寝室几乎成了大戏院，真是非常热闹，简直快把耳朵震聋了。我俩互不协调的结果，引得邻室的同学都来看戏了。这成了当时的一大笑话。

时光一晃，几十年过去了。健章学长凭他不懈的钻研和学习，在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，如今已是我国学有所成的古文泰斗了。古文泰斗，竟是我相互有过孩子气、同居一室有吵有闹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啊。相比之下，我感到很惭愧，特别是健章学长已经过世了，更让我有无限的敬慕和怀念。凡是人，都会有过孩子气，孩子气常常能促进自由发展，取得事业的成功。

如今我已95岁了，回忆往事，感慨不已。健章学长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我要认真向你学习啊！

1930年夏，老舍应聘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国语研究所文学主任。他到济南执教后，不仅撰写了好些优美散文，还在同年冬着手创作《大明湖》。

老舍的《大明湖》，完成于1931年暑期。他于1935年11月在上海《宇宙风》杂志发表《我怎样写〈大明湖〉》，其中说：“《大明湖》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，因为想着‘五三’。可是‘五三’并不是正题，而是个副笔。设若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，我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，而我深怕笔力与材料都不够写那么硬的东西。我需要个别的故事，而把战争与流血到相当的时机加进去，既不干枯，又显着越写越火炽。”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描述：一对母女因贫病交迫卖身为娼，最终母亲无法忍受折磨跳了大明湖；饱受欺凌的女儿也萌生寻短见的念头时遇兄弟三人而获救，于是出现了特别的恋情，后来发生“五三惨案”，老三被日寇杀害，剩下老大、老二忍受着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。它以一个不幸的家庭为缩影，折射了民族的灾难。大概由于题材太沉重，其风格与老舍以往作品的幽默洒脱有明显不同，从中可见他的创作已在关注贫苦百姓的生存困境。

当年，老舍的前四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《赵子曰》《二马》《小坡的生日》，都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《小说月报》；在《大明湖》脱稿时，他又寄了过去。编辑部收到稿件后，拟在“新年特大号”上开始连载，并于1931年12月作预告：“《大明湖》心理的刻画，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，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，全文约二十万字。”谁知，陡生重大变故，老舍的《我怎样写〈大明湖〉》谈到：“过了年，稿子交到印工手里去，‘一·二八’的火把它烧成

不久前，有位著名作家因为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而引发激烈的情绪反弹。北方一位同样也很著名的资深评论家在电话中跟我说了一句：“中国作家的心理都很脆弱！”

这句话口头说说可以，但落到纸面变成文字，却大可商榷。因为这是一个全称判断，说所有中国作家心理都很脆弱，显然与实际不符。说有些作家心理脆弱，更精准些。《文学报·新批评》创刊半年，以“好话全不讲”的锐利批评风格为文坛所普遍关注。它指名道姓批评过的作家作品可以列出一长串。以我的直接观察，有些作家即使心里不快，但起码在面子上仍能坦然面对。有的作家甚至对批评他的文章表示欢迎和称道呢！比如甘肃小说家雪漠，《新批评》发过李建军批评他长篇小说《西夏咒》的文章，新近又发过批评他一篇短篇小说的文章。近日，笔者去京参加“甘肃小说八骏”研讨会，雪漠也是“八骏”之一。“狭路相逢”，我原以为雪漠会做出类似“反唇相讥”“冷脸相对”甚至更激烈的情绪反应，没料到他却呵呵地主动跟我提起最近批评他的那篇文章，连说“写得好，写得好！”接着又说：“这是有效传播。批评是现代传播学中有有效手段之一。因为现在说好话的文章没人看，批评更能吸引读者眼球，扩大作品影响。”雪漠能如此大度地允许别人对自己创作说三道四，难能可贵。

那么哪类作家心理最脆弱？其脆弱的根源又在何处？有什么有效方式变“脆弱”为“坚韧、坚强”呢？

我非心理学专家，分析未必切中肯綮。幸好多年前曾经采访过一位心理学研究专家，并写过一篇有关她的心理研究文章，从她那里学到一点心理学知识。最近为完成一部探索小偷犯罪心理的报告文学，又涉猎了一些有关犯罪心理的研究专著。有了这些积累，笔者斗胆尝试作一点分析：心理最脆弱的人，往往是人生旅途中最一帆风顺的人，因此稍经风浪，就容易产生心理恐惧。一位作家如果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，持续多年听到的都是一片叫好之声，长期以来他已经完全习惯了被表扬。尽管有些“表扬”是敲鼓手赠予的“皇帝的新衣”，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但一旦有不识时务者，戳破那“新衣”，他就会产生心理难以承受的大厦将倾的崩溃感，作出常人理解的丧失理智的心理反弹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改变这样一种脆弱的心理状态的有效办法就是“挫折训练”。虽然几乎无人愿意经受人生挫折，但“挫折”确实会使人变得坚强。

对从未受过批评的作家，对一有批评就作出非正常反弹的作家，使其适应、理智对待批评的最佳途径是继续批评，而不是像哄小孩似的，跺几下地板，让他获得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。否则，其心理还将继续“脆弱”下去。一些名作家，起初看到李建军的批评文章时，都曾作出过激烈的情绪反应，后来再看到批评文章时，心态就平和多了。

心理脆弱的另一原因是有作家缺乏足够的艺术自信，他们需要营造一种虚幻的“自尊”来维系那根虚弱的自信之索。如何使他们的艺术自信充盈起来，还是请心理学家支招吧！我的这点心理学知识皮毛，已经不够用了。

当然有一种恐惧批评的原因，或许跟心理是否脆弱毫无关系，只跟利益有关。批评影响到他的文坛“江湖”地位，影响到他在梁山泊坐第几把交椅，这问题如何解决，大概心理学家也无可奈何。

哪类作家心理最脆弱？

陈歆耕

门神之争

啸秦



这让我想起前两天翻过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怪力乱神之事自不必多说，其中有一篇短文倒是真人真事：纪大学士的两位曾伯祖，“一讳景星，一讳景辰，皆名诸生也。”当时全家住在河间府，听说乱军将至打算逃到乡下避难。正准备离开时，邻居一位老翁看着门神感叹道：“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、秦琼，当不至此。”两位名学士一听觉得好笑，指着门神说，这是神荼、郁垒的画像，不是尉迟敬德和秦琼。那邻居老翁也不服气，立马回家翻出《西游记》作为证据；而这两位名学士自然不认输，嗤笑老翁竟用小说来作考据，同时放下逃难的包裹，回屋翻箱倒柜找出了东方朔的《神异经》。这一来二去，竟不知不觉拖到了城门关隘之后。待到第二日想要出城，却是兵临城下，最终不得逃生。

提起这故事倒并非贬责那孩子，自古以来圣贤也不乏痴人，何况这份“书呆气”也是难能可贵。只是套用姚安公所言：“读书之余，亦当使略知家事、略知世事，而后可以治家，可以涉世。”



回家 (中国画) 陈可爱

年前，传来一则消息，说某汽车行业单位今年的年终奖包是27个月的工资，听后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因为本单位也属于汽车行业，年终奖想必也不会少。可年终奖分配方案公布，大家一看都傻眼了。除了少数几个高管上万，普通员工（含两张百元面值的购物卡在内）基本没有超过六千元的。虽说比往年“多收了三五斗”，但与前面提到的单位相比，显然不在一个档次，难怪不少像我这样既无权又无灰色收入的工薪族要羡慕嫉妒恨了。

不过，失落归失落，年还是要过的。

常言道，富有富安排，穷有穷打算。到手的年终奖红包远低于预期，那就只有改变原先定好的计划了，即出国游不去了，金饰品不买了，家用电器不换了……将年终奖统统用于还人情债算了。于是，我便和妻子一起从床头柜

里翻出一本小册子，上面写满了我家前前后后、方方面面、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债。

其中，我认为最急于要还的是几个老长辈的人情债，就是我儿子去年结婚时收到的礼金。对于一些中青年亲戚朋友送的

年前几个“乔迁之喜”、三年前为女儿办的“谢师宴”等）则按当时我收到的礼金分别“报之以李”，或请人家吃饭、K歌，或买健身卡、保健品送之……这么一算下来，到手的年终奖也就差不多了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你原本就觉得年终奖不给力，现在又一分不留，统统用于还人情债，这个年一定过得挺没劲、挺郁闷的，其实不然。殊不知，我每还掉一笔人情债就意味着丢下一个包袱，心情自然会开朗起来，毕竟人们过日子图的是一个舒心，无债一身轻嘛！

年终奖如何上了墙？明日请读。

十日谈

我的年终奖

『一·二八』的《大明湖》

朱少伟



龙游四海 (中国画)

徐旭峰

了灰。没留副稿。”1932年1月28日，侵华日军发动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、总厂及编译所、东方图书馆等都被毁，《大明湖》也在劫难逃葬身火海。

老舍毕生从事文学创作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然而，这位人民艺术家的《大明湖》毁于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则是我国现代文

